



# 深圳金融改革开放再深化

——专访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

深圳在金融领域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深圳自己的行政区划，而是必须立足于大湾区整体的独特优势，注重借鉴香港的国际化经验，加强与香港的密切合作。

文 | 马力 苏慧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

深圳市用了40年时间，从边陲渔村变为亚洲第五大城市、全球第十一大金融中心城市。深圳去年首次进入“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前10位，40年来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8%，

创造了全市约1/6的GDP和近1/4的税收。

作为我国金融改革的“排头兵”和“试验田”，深圳创造了多项金融业“第一”：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第一笔按揭贷款、第一家银联公司、第一个放开黄金饰品市场等。

站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的节点，同时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全

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英大金融》记者飞赴鹏城专访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先生，解答深圳金融改革开放如何再出发。

## 把握区位优势 全面扩大开放

**英大金融：**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到：“党中央经过深入研究，决定以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为契机，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改革试点，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一揽子推出27条改革举措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其中涉及金融改革开放的有很多，诸如支持在资本市场先行先试；开展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等。您如何看待深圳的金融改革开放？

**王永利：**中央强调，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大循环，要坚定不移地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拥有香港和澳门两个直接连通国际社会的特别行政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最大特色。大湾区以前是、今后仍将是我国对外开放，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桥头堡、试验区。深圳必须立足于先行示范区和大湾区核心引擎的定位，抓住国家大力推动大湾区建设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大湾区的独特优势，在金融领域着重于开放促改革、创新促发展。

深圳在金融领域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深圳自己的行政区划，而是必须立足于大湾区整体的独特优势，注重借鉴香港的国际化经验，加强与香港的密切合作，形成

与香港相比，与作为先行示范区和标杆城市的要求相比，与中国金融扩大对外开放、形成国际领先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战略目标相比，深圳在这方面仍存在很大差距，仍需深化改革开放。

深港澳或深广港澳一体化的国际金融中心，共同打造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越的全球标杆城市综合体，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

**英大金融：**您认为推动深圳金融改革开放的抓手是什么？如何进一步推动呢？

**王永利：**首先，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金融机构要实现核心系统统一、客户资源共享和大陆与港澳的通存通兑、业务互认；要特别重视各类金融交易所的发展。大湾区各类交易所要实现互联互通，鼓励其相互持股、整合优化，实现公司化、国际化、一体化发展，真正形成具有重要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交易中心，并带动行业分析、财务审计、信用评级、上市顾问等相关行业的人才聚集与交流发展；积极推动金融产品、交易方式、制度规则、金融监管等方面的联合创新，特别是在数字货币、数字金融、线上交易和外汇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在这方面，应充分发挥香港的重要作用。

其次，推动金融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发展。要努力减少政府对金融机构（包括交易所）在股权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直接参与或干预，培育公平公正、相互促进的政商关系与营商环境，推动金融机构在充分市场竞争中增强自身实力与竞争力。

在这方面，深圳在大陆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也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中，改革开放之后成立于深圳的平安集团与招商银行才能异军突起，发展成为市净率远高于同业的金融机构。其中，以当前水平而言，平安集团市值规模已经超过建设银行与中国人寿，仅次于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市值规模则超过中国银行，甚至达到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的3倍左右，达到民生银行市值的近5倍。

但是，与香港相比，与作为先行示范区和

标杆城市的要求相比，与中国金融扩大对外开放、形成国际领先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战略目标相比，深圳在这方面仍存在很大差距，仍需深化改革开放。所以，必须抓住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中国仍处于重要发展机遇期，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力度明显加大，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加快，中国市场的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明显增强的重要机遇，加强与港澳合作，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着眼于打造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交易中心，勇于在金融制度和交易规则上实现突破，放宽准入、扩大开放、严厉监管，更好地与国际主流接轨。

## 监管要优化 市场要开放

**英大金融：**为使深圳金融发展更好地与国际主流接轨，应如何处理好市场和监管的关系？

**王永利：**这要处理好金融发展、稳定和安全的关系，大湾区金融要在开放、创新、发展方面先行先试，积极突破，但金融法规建设和金融监管执行也必须跟上。既要鼓励开放创新，弘扬敢闯敢试敢干的精神，也要优化和加强金融监管（包括粤港澳三方联合监管），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减少监管漏洞或监管重叠。对金融机构或控股公司实际控制人要实行穿透式监管，严格控制其违规支配和挪用所投金融机构的资金。督促上市公司规范使用募集资金，依法披露资金使用情况。监管部门要坚持原则、严守监管底线，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要在健全金融机构公平竞争和反垄断审查机制，加强数据资源产权确认和保护、数据资产交易流通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建设，加强法人和个人信息与隐私保护

作为人民币新的数字化运行形式，数字人民币必须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国际货币与支付清算体系变革。

等方面走在前面，树立标杆。

在加强大湾区相互合作的过程中，要打破行政藩篱、充分扩大开放，确保交通通信、人流物流的通畅，政府应注重符合国际化要求、公平合理的规则制定和实施，在此基础上，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在自由竞争环境中的创造性、主动性和能动性，务必控制脱离市场条件的各种优惠补贴扶持政策，不能厚此薄彼、区别对待。必须看到，不经过市场竞争的洗礼，依靠政府扶持的各种创业和产业都是难以健康长久发展的。

## 数字钱包试点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英大金融：**2020年10月12~18日，中国人民银行（央行）与深圳市政府联合实施了一次规模很大、流程较全的数字人民币社会公测或实际试运行，涉及近5万名个人用户、3389家商户以及人民银行（数字人民币发行机构）、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数字人民币运营机构），共计6万多笔实际交易（个人消费支付和少量数字人民币钱包充值）、近900万元支付金额，标志着数字人民币已经趋于成型、“呼之欲出”了。您如何看？

**王永利：**直观看，其中似乎确实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变化。但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数字人民币需要下载的是央行统一的App，而不是各家兑换运营机构与支付结算服务运营机构自己独立的App。各家运营服务商同样需要下载央行统一的App，其为为用户开立的“数字人民币钱包”，只是与央行“数字人民币App”相互勾连的配套设施。这就带来数字人民币支付运行体系和机制上的重大变化。



央行成为数字人民币的运行核心入口和清算中心。央行可以通过统一的“数字人民币App”入口实现跨运营机构的互联互通，并获取所有数字人民币所有者（包括个人、单位、金融机构等）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等，在数字人民币平台（数字人民币登记中心）为每个所有者建立数字人民币唯一的备查账户，形成全社会在央行的“数字货币一本账”。数字人民币每一笔收付，相关信息都要同时发送央行进行被查账户的核查处理，使央行能够全面掌握数字人民币兑换、流通的全量交易信息，实时掌握数字人民币的总量和分布情况，并可进行必要的监测分析与调控，从而大大提升货币政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这一变化也符合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不同的本质特征：数字货币将货币与支付结算紧密

融合，实现“货币即支付、支付即结算”——这也正是央行此前把其要推行的数字货币叫做“DCEP”的重要原因。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不应改变货币的本质和金融机构的职责定位，最有可能变革的就是货币支付运行的体系和机制。

目前数字人民币尚未对外（包括港澳）开放，而仅限于大陆居民，需要用大陆二代身份证和大陆手机号注册。但作为人民币新的数字化运行形式，数字人民币必须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国际货币与支付清算体系变革。在这方面，可以率先对港澳开放，并在取得经验具有一定把握情况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英大金融：**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窗口，深圳前海自贸区有更多试错和创新机遇，您如何看待人民币国际化这一进程？

**王永利：**人民币国际化，先从推动港澳货币体系的变革开始。长期以来，香港货币采取与美元联系汇率制度（与美元绑定），澳门货币采取与港币联系汇率制度（间接与美元绑定），这种做法增强了港澳货币的国际信誉，为其发展国际业务创造了重要条件，但也使其货币政策自主性空间被严重束缚，很容易成为国际资本冲击的对象，并且仅仅依靠其自身力量难以有效应对。随着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特别是美国连续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的汇率出现大幅波动，这种绑定英镑或美元的货币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殖民地货币政策，存在的问题也大量暴露，完全有必要进行变革。可以采取绝大多数国家的通常做法（新加坡也是一样），转为与一揽子主要国家货币结构性挂钩方式，保持货币政策充分的自主权与灵活性。□

（作者分别系本刊访谈主笔、本刊记者）